

压力、资源与流动老人幸福感

丁百仁 王毅杰

内容提要 在人口迁移转变的新时代,流动老人生活质量引发高度关注。本文以幸福感为切入点,在压力过程理论指导下,基于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考察了流动老人主观生活质量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流动老人生活评价总体良好,幸福感处于中上水平,但城—城流动老人的幸福感优于乡—城流动老人。流动老人在迁移过程中的多重压力显著制约了幸福感,主要表现为经济保障压力和社交生活压力越大,幸福感越低。作为资源代表的家庭关系网和自我效能感均会促进流动老人幸福感,其中家庭关系网的作用更大,且自我效能感在迁移压力与幸福感之间扮演调节和中介的双重保护功能。因此,政府在化解压力的同时,还要开发资源,有效提升流动老人的生活福祉。

关键词 流动老人 幸福感 压力过程理论 城乡比较

丁百仁,河海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

王毅杰,河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问题的提出

21世纪以来,伴随流动人口年龄增长和家庭化迁移增多,流动老人的数量和比例剧增。据人口普查数据测算,老年流动人口从2000年的503.02万升至2015年的1304.30万,占老年人口的8.01%^[1]。也就是说,流动老人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庞大群体。然而,他们在迁入地生活得如何,不仅关乎该群体福祉,也深刻影响着社会和谐。

众所周知,生活质量是老年人口生活美满与否的核心问题之一,其所观照的是他们在物质和精神生活方面的综合状况。而流动老人的生活质量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其对迁入地的适应程度,与低龄流动人口相比,他们因受年龄和人力资本等的局限,常常被忽视,或深感很难融入流入地的社会生活中^[2]。

本文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流动老人社会保障研究”(2019B62714)阶段性成果。

[1]段成荣、谢东虹、吕利丹:《中国人口的迁移转变》,〔北京〕《人口研究》2019年第2期。

[2]杨菊华:《流动时代中的流动世代:老年流动人口的多维特征分析》,〔长春〕《人口学刊》2018年第4期。

梳理过往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发现,已有不少学者开始关注流动老人生活质量特别是客观生活质量,以及城市融入、社会参与或生活适应等问题。但与此同时,这些研究却忽视了流动老人主观生活质量,这就使得一些研究既不够全面,或形成误识,正如加尔布雷思在《富裕社会》中所言,对于个体或群体,生活质量的主客观两个面向可能不一致,甚至相反^[1]。

还有学者指出,幸福感可以成为衡量主观生活质量的最常用工具,它是人们根据内心标准对生活状况做出的整体评价^[2]。人们幸福与否不仅能折射出他们对当前生活的真实感受,也能反映出他们对自我发展的未来预期。由此,本文将以幸福感作为切入点来考察流动老人的主观生活质量。由于迁移是流动老人的“身份标识”,且又是一个伴随众多变化和充满压力的过程。因此,本文将以压力过程理论为指导,来进一步考察流动老人在迁移过程中的压力、资源与幸福感之间的内在联系。

二、理论视角与研究假设

(一)压力过程理论下的流动老人幸福感

尽管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研究最早可追溯至古希腊古罗马,但现代意义上的幸福感研究却始于20世纪60年代,伴随主观生活质量和社会指标运动发展起来,并以威尔逊的《自称幸福的相关因素》为代表——他在文中对幸福感进行了系统性的理论阐述和概括总结^[3]。此后,在幸福感研究的漫长历程中,关于幸福感的探讨从抽象走向具体,且影响(或相关)因素也逐步走向多元和综合。随着研究的深入,迪安娜又将影响幸福感的所有因素区分为经济、生活事件、人口社会学等外部因素和个体的基因、人格、心理等内部因素^[4]。我国学者又归纳出,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包括年龄、性别、教育和财富等个体因素和其所处的时期、世代、社会等宏观因素^[5]。

伴随着幸福感及其解释的深入,学界形成了诸多幸福感理论模型,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自我决定模型、调节—缓冲模型、人格与环境交互作用模型、文化常模模型理论、社会比较理论和压力过程理论等。而压力过程理论因揭示迁移转变带来的压力传导效应而流行于移民心态研究中^[6]。舒瓦尔指出,与迁移有关的诸多转变将导致移民压力倍增,难以适应新环境,容易诱发精神健康问题^[7];乔治等也发现,移民过程中的创伤、日常烦恼和其他不良事件压力将给移民带来心理困扰与痛苦^[8]。

总之,压力过程理论是将压力对个体产生影响过程中涉及的各种元素整合为一个统一体系的理论。这一范式始于加拿大生理学家塞尔耶,他于1956年首次将压力界定为任何对有机体造成损耗的事物,并引入心理健康议题^[9]。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泊林及合作者的《压力过程》发表,社会科学界

[1]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富裕社会》,赵勇、周定瑛、舒小昀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9页。

[2]Diener, Ed., "Subjective Well-being",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84, 95(3), pp.542-575.

[3]Wilson, W. R., "Correlates of Avowed Happines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67,67(4), pp.294-306.

[4]Diener, E., et al., "Subjective Well-being: Three Decades of Progres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99, 125(2), pp.276-302.

[5]洪岩璧:《再分配与幸福感阶层差异的变迁(2005—2013)》,[上海]《社会》2017年第2期。

[6]Pearlin, L. I., Lieberman, M., Menaghan E., Mullan J., "The Stress Process",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1981, 22, pp.337-356.

[7]Shuval, J. T., "Migration and Stress", in Goldberger, L.B. and Shlomo, B.(eds.), *Handbook of Stress: Theoretical and Clinical Aspects*, New York: Free Press,1993, pp.641-657.

[8]George, M., Jettner, J., "Migration Stressors,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nd Family—a Sri Lankan Tamil Refugee Analysi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 Integration*, 2016,17(2), pp.341-353.

[9]Selye H., *The Stress of Life*, New York: McGraw-Hill,1956.

尤其是社会学关于此项研究正式迈入一个新纪元。在该文中,泊林运用“压力过程”的分析框架来整合此前研究,梳理出了压力来源(Sources of Stress)、中介资源(Mediating Resources)和压力后果(Manifestations of Stress)三个概念领域,搭建出了其相互联系构成压力过程理论的模型。这其中,压力来源包括社会的边界、结构和文化,当接近个人经历时,压力被视为由离散事件的发生(The Occurrence of Discrete Events)和相对连续问题的存在(The Presence of Relatively Continuous Problems)两个广泛环境引起;中介资源指涉用来为自己辩护的各种因素,主要分为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s)和应对(Coping);压力后果一般选择心理健康类的因变量如幸福感^[1]。此后,压力过程理论与经验研究就沿着这两条脉络发展:一是压力暴露(Stress Exposure)的方向,一是压力易感性(Stress Vulnerability)的方向。前者主要涉及对压力来源的探索,这方面研究主要围绕急性生活事件、慢性生活压力以及日常生活烦恼等展开,考察其对个体生理、心理或行为倾向的影响;后者主要涉及影响个体易感性的因素,它们通过各种调节与中介作用影响个体对于压力的反应,如社会支持、自我效能感及控制感等^[2]。

在压力过程理论视角下,流动老人幸福感的影响过程与路径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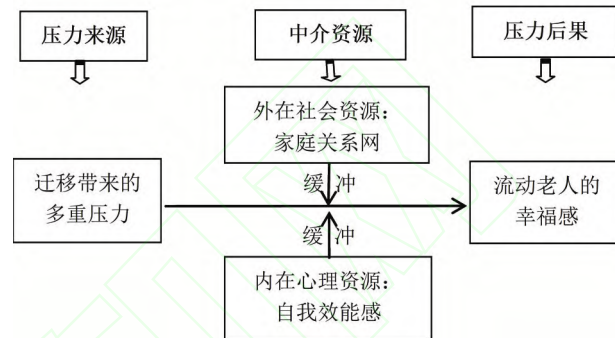


图1 压力过程理论下的流动老人幸福感

(二) 研究假设:压力暴露机制与流动老人幸福感

我们知道,迁移是流动老人最显著的“身份标识”,在迁移过程中他们还常常会遇到各种压力,并进一步影响其自身的心理状态。因此,我们认为,可以使用压力过程理论来透视流动老人幸福感。此外,本文还将承袭压力过程理论的两条研究脉络,综合考察压力暴露机制和压力易感性机制与流动老人幸福感的关系。其中,压力暴露机制的核心观点是,诸如人口迁移、经济危机、政治波动等结构性因素会通过何种方式影响几类压力源(如急性生活事件)的暴露程度,作用于人们的社会心理(如幸福感)。通常,人们生活情境变动越大,其所遭遇的压力源越多,感受到的负向冲击越强,幸福感也就越低。西方经验研究表明,人口迁移将使流动者面临气候、语言、经济和文化等的改变,并产生很多外部压力,使其精神状况糟糕^[3]。同样地,作为流动队伍的重要组成,流动老人在迁移过程中的压力越大,其幸福评价也越消极。据此我们提出假设1。

假设1:迁移压力越大,流动老人幸福感越低。

研究显示,人们在流动、融合和定居过程中会遭遇不同的压力,这些压力至少涉及以下四类议题:一是生存性议题(如工作),二是交往性议题(如社交生活),三是文化性议题(如语言),四是制度性议题(如歧视政策)等^[4]。而在本研究中,我们将主要从经济保障压力、社交生活压力和制度排斥压力三个方面重点透视流动老人的迁移压力及其对老人幸福感的影响。从经济保障压力来看,一定的经济

[1]Pearlin, L. I., Lieberman, M., Menaghan, E., Mullan, J., "The Stress Process",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1981, 22, pp.337-356.

[2]Pearlin, L. I., Bierman, A., *Current Issues and Future Directions in Research into the Stress Process*, New York: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2013.

[3]Bhugra, D., "Migration and Mental Health", *Acta Psychiatrica Scandinavica*, 2010, 109(4), pp.243-258.

[4]Llacer, A., Amo, J. D., Garcia-Fulgueiras, A., et al., "Discrimination and Mental Health in Ecuadorian Immigrants in Spain",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 Community Health*, 2009,63(9), pp.766-772;何雪松、黄富强、曾守锤:《城乡迁移与心理健康:基于上海的实证研究》,〔北京〕《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1期。

保障是流动老人的生存之本,能够满足他们生活的基本需求,进而增加幸福感。相关学者也证实了经济安全感在老人幸福感的自我评估中扮演重要角色,而经济保障不足会降低其幸福感^[1]。从社交生活压力来看,拥有一定人际关系,参与一定社交活动,会在更高层次上影响老人对于压力的反应与精神生活需求,有助于改善幸福感。从制度排斥压力来看,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与户籍制度不仅导致公共服务排斥流动人口,还带来了本地居民的歧视,这是流动老人无法避免成为“局外人”的制度藩篱效应,并对其幸福感产生消极影响。因而,得到以下几个次级假设:

假设 1a:经济保障压力越大,流动老人幸福感越低。

假设 1b:社交生活压力越大,流动老人幸福感越低。

假设 1c:制度排斥压力越大,流动老人幸福感越低。

(三)研究假设:压力易感性机制与流动老人幸福感

个人或群体的压力后果(如幸福感)不能仅从其面临的压力来完全预测,还受能够用以应对压力的各种资源的影响,这就是压力易感性机制的核心要义。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那些影响个人或群体易感性的因素会通过调节或中介作用影响他们对压力的反应与结果,进而改善内心体验。一般来说,面临压力时,个人或群体所拥有的影响其易感性的积极因素越多,起到的缓冲效果会越好,社会心理状态也越佳。

然而,在压力易感性机制中,资源又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泊林认为,人们在压力过程中可以拿来为自己辩护的资源有两类:一是社会支持;二是应对资源。前者重点强调外部关系网络的客观支持,后者主要涉及内在心理资源的主观调适。分析时,社会支持和应对资源往往被视为两个独立且无关的议题予以讨论,不过,两者都是一种资源,人们可以利用它来调节压力,且其在压力过程中的作用相似^[2]。

由于,相比暴露机制中的压力源探索,在易感性机制中充当压力调停者的资源与其影响机制研究较少;因而,本文将同时考察社会支持、应对资源与流动老人幸福感的关系。

1. 作为社会支持的家庭关系网与流动老人幸福感。

所谓社会支持是指“在坎坷的人生中接近和利用其他个体、团体及较大社团的可能性”,表现为一种实际关系网络,包括那些稳定的(如家庭)或不稳定的(如短暂性交流)社会联系的大小和获得程度^[3]。

社会支持对个人或群体心理的影响机制存在两种不同观点:一是主效应模型,认为社会支持对人们心理具有独立的增益作用,它不一定要在应激情况下才发挥,而是在平时也维持个体良好的内心体验。二是缓冲器模型,认为社会支持通过调节其他因素(如压力)对于心理的消极影响来提升人们的幸福感^[4]。

而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家庭关系与家庭支持往往比较容易获取,并会成为人们面临困境时的首选对象。家庭作为老人关系网络的重要组成,是老人获得各种支持的主要来源,更对老人需求满足和幸福评价有直接影响。随着老人们工作角色和其他角色功能的丧失,他们对家庭关系会更加重视。这对于漂泊在外的流动老人更是如此,即他们对家庭关系的支持十分热切,同时家庭关系也深刻地影响着他们的幸福感。因而,我又进一步提出以下两个次级假设:

假设 2a:家庭关系网越好,流动老人幸福感越高。

假设 2b:家庭关系网在迁移压力与流动老人幸福感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1]张伟、胡仲明、李红娟:《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分析》,〔北京〕《人口与发展》2014年第6期。

[2][3]Pearlin, L. L., Lieberman, M., Menaghan, E., Mullan, J., "The Stress Process",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1981, 22, pp.337-356, pp.337-356.

[4]肖水源、杨德森:《社会支持对身心健康的影响》,〔北京〕《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87年第4期。

2. 作为应对资源的自我效能感与流动老人幸福感。

如果说以家庭关系网为代表的社会支持是来自周围的外部帮助,那么,应对资源则是内嵌于自身的主动调适,彰显了个体的能动性。正如泊林所言,后者在压力过程中的主要功能是应对,但应对不是一种不顾人们所面临问题的性质而激发出来的一般性倾向,而是随着各种问题的产生以及因社会角色变化伴之而来的具体行为。泊林认为,根据功能区分,个体的主动应对至少有三种:一是改变引起压力问题的情境,二是以减少威胁的方式改变问题性质,三是压力症状的处置^[1]。

也就是说,同为压力易感性机制的中介资源,应对资源与社会支持在功能上相似,即通过调节潜在压力源向现实压力感的转化来缓解个体压力,只是执行主体不同。阿内森塞尔指出,应对和社会支持是功能同构的概念,其中应对为自我采取的行动,支持则指他人采取的行动,它们具有平行功能,影响压力性生活体验的发生和影响^[2]。有学者指出,应对资源一方面能起到调节压力影响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受到压力的侵蚀,成为直接导致心理疾病(如不幸福)的中介变量,且两种作用几乎同时存在^[3]。

还有学者提出,自我效能感犹如社会支持一样,能够缓解压力带来的负面冲击,正如莫蒂·斯特凡尼等的调研所证实的,自我效能感在希腊青少年移民的社会适应压力与幸福感的紧张关系中有缓冲功能^[4]。徐延辉等的研究也发现,自我效能感不仅改善外来人口的心理状态,还在社会环境与他们的心理融入之间有部分中介效应^[5]。同样,流动老人的自我效能感也会通过调节和中介作用影响压力的感知与反应,进而影响幸福感。由此,得到以下几个次级假设:

假设3a:自我效能感越强,流动老人幸福感越高。

假设3b:自我效能感在迁移压力与流动老人幸福感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假设3c:自我效能感在迁移压力与流动老人幸福感之间具有中介效应。

三、数据、变量测量与描述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2014年中国人民大学联合全国各地学术机构共同完成的“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数据。CLASS是一个全国性、连续性的大型社会调查项目,该调查定期、系统地收集老年人的社会、经济数据,掌握老年人面临的各种问题和挑战,评估老年人社会政策的实施效果等。调查采用分层多阶段的概率抽样方法,调查对象为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调查范围覆盖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共476个村/居委会。在本文中,我们根据流动状态变量“您的户口是不是在本区/县?”甄别出流动老人样本,删除变量缺失项后最终纳入的分析样本为586份。

(二)变量测量与描述

1. 因变量:幸福感

迪安纳在《主观幸福感:三十年进展》一文中对幸福感的概念模型与要素构成进行了系统总结,认

[1]Pearlin, L. I., Lieberman, M., Menaghan, E., Mullan, J., "The Stress Process",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1981, 22, pp.337-356.

[2]Aneshensel, C. S., "Social Stress: Theory and Research",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992,18, pp.15-38.

[3]梁樱:《心理健康的社会学视角——心理健康社会学综述》,〔北京〕《社会学研究》2013年第2期。

[4]Motti-Stefanidi, F., Asendorpf, J. B., Masten, A. S., "The Adaptation and Well-being of Adolescent Immigrants in Greek Schools: A Multilevel, Longitudinal Study of Risks and Resources",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2012,24(2), pp.451-473.

[5]徐延辉、龚紫钰:《社会质量、自我效能感与城市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沈阳〕《社会科学辑刊》2016年第2期。

为幸福感的主要成分。生活满意度与情感平衡。其中生活满意度是人们对生活中各个方面的总体认知判断,而情感平衡则是人们对生活中各种事件总体情绪的反应,即积极与消极情感的平衡^[1]。

据此,本文参照迪安娜的幸福因素测量模型来考察流动老人幸福感,其中,生活满意度通过问卷中“总的来说,您对您目前的生活感到满意吗?”来反映,积极情感通过问卷中“过去一周您觉得自己心情很好吗?”来反映,消极情感通过问卷中“过去一周您觉得心里很难过吗?”来反映。分析时,通过主成分因子法将以上三道题合成幸福感指数,取值1~100,得分越高表明流动老人幸福感越高。

2. 自变量:迁移压力、家庭关系网和自我效能感

迁移压力包括经济保障压力、社交生活压力和制度排斥压力。其中,经济保障压力考察流动老人在迁入地获取保障及生存所必需的物质和环境资源的难易程度,包括就业、收入、福利与保障等。本文选择三个相对重要且操作性强的测量指标:一是被访者就业情况,即“目前您是否从事有收入的工作/活动?”;二是被访者收入情况,即“过去12个月,您个人的总收入是多少?”;三是被访者社会保障情况,即“您享受以下社会保障待遇的情况”(包括:养老金、最低生活保障金、政府其他救助等10项)来反映。分析时,通过主成分因子法合成经济保障压力指数,取值1~100,得分越高表明经济保障压力越小。社交生活压力考察流动老人在迁入地作为社会人进行必要联系与交往需要的可能性,通过被访者对社交生活状况的主体感知,如“过去一周您觉得自己没人陪伴吗?”“过去一周您觉得自己被别人忽略了吗?”“过去一周您觉得自己被别人孤立了吗?”来反映。分析时,通过主成分因子法合成社交生活压力指数,取值1~100,得分越高表明社交生活压力越小。制度排斥压力考察流动老人在迁入地作为合法公民享受同本地居民均等的权利与待遇的客观限制,本文选择三个相对重要且操作性强的测量指标:一是政治层面的选举权利获得,即“近三年您是否参加过本地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的投票选举?”;二是社会层面的福利待遇获得,即“您在本地是否享受过老年人优待?”;三是政策层面的主体认可程度,即“当今越来越多的新社会政策让我难以接受”。分析时,通过主成分因子法合成制度排斥压力指数,取值1~100,得分越高表明制度排斥压力越小。

家庭关系网是流动老人社会支持的代表性指标,也是其最亲密的外在支持系统。所谓家庭关系网是指家庭成员之间彼此联系、交流与互助的稳定形态,反映了流动老人在迁入地面对困难和压力时能够获取家庭成员支持的可能性,通过问卷中“您一个月至少能与几个家人见面或联系?”“您能和几个家人放心地谈您的私事?”“当您需要时,有几个家人可以给您提供帮助?”来反映。分析时,通过主成分因子法合成家庭关系网指数,取值1~100,得分越高表明家庭关系网越好。

自我效能感是流动老人应对资源的代表性指标,也是其最坚强的内在调适力量。所谓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对自我能否在一定水平上完成某项活动所具有的能力判断、信念或者把握,反映了流动老人在迁入地面对困难和压力时获取自身主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分布
连续型变量	均值(标准差)
幸福感	80.423(19.693)
经济保障压力	55.250(16.239)
社交生活压力	90.472(19.908)
制度排斥压力	47.098(22.823)
家庭关系网	58.314(19.558)
自我效能感	48.165(21.854)
离散型变量	百分比(%)
性别	男,49.3;女,50.7
年龄	低龄老人,60.9;中龄老人,30.2;高龄老人,8.9;
婚姻状态	不在婚,27.8;在婚,72.2
宗教信仰	无,87.2;有,12.8
户口性质	农业户口,43.3;非农业户口,56.7

[1]Diener, E., et al., "Subjective Well-being: Three Decades of Progres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99, 125(2), pp.276-302.

动应对资源的可能性,通过问卷中“您同意下面这些观点吗?(‘老了以后,我发觉更难交到新朋友了’‘年龄越大的人处理生活问题的能力越强’‘我觉得,我还是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来反映。分析时,通过主成分因子法合成自我效能感指数,取值1~100,得分越高表明自我效能感越强。

3. 控制变量

本文还将可能影响流动老人幸福感的性别、年龄、婚姻状态、宗教信仰、户口性质等社会人口学特征纳入控制变量。它们均为二分变量,其中,性别赋值为“女=0,男=1”,婚姻状态赋值为“不在婚=0,在婚=1”,宗教信仰赋值为“无=0,有=1”,户口性质赋值为“农业户口=0,非农业户口=1”。

四、结果分析与假设回应

(一)流动老人幸福感的分布与特征

幸福感的动态平衡模型指出,人们的幸福感基线并非静止不动,任何超过正常范围的生命事件(如贫困、饥饿、下岗、迁移等)的发生都会引起幸福感变化:使幸福感升高、降低或保持平衡^[1]。相比一般老人,外出迁移是流动老人生命历程中的关键事件,势必会对其幸福感产生影响,但由于外出迁移是风险性与机遇性并存的生命事件,因而对其幸福感的影响又具有不确定性。根据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全体流动老人幸福感的平均值为80.423,即流动老人幸福感总体良好。该发现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迁移对流动老人的积极效应,通过增加经济收入、加强亲人团聚、丰富社交生活等方式可以改善他们的生活现状,进而影响其幸福评价。

与此同时,流动老人幸福感平均得分的样本标准差比较大,取值为19.693,这说明流动老人的幸福感分布存在不均衡性,尤其体现在城乡差分上。城一城流动老人幸福感的平均得分为82.482,远高于总体平均得分,而乡一城流动老人幸福感的平均得分仅为77.732,且后者波动性更大,其幸福感平均得分的样本标准差为21.068,大于城一城流动老人的18.338。同时,差异性检验($t=2.912, p<0.05$)表明,城一城和乡一城流动老人之间的幸福感差距是显著的,而这源自城乡二元体制的“现实排斥”抑或“历史遗留问题”的深远影响,再加上乡一城流动老人的生活、思想和行为方式与城市相差较大的影响。

此外,无论是从总体分布还是从内部分化看,均发现迁移与流动老人幸福感的关系复杂:尽管总体状况良好,但仍有相当一部分人感到不幸福,存在较大提升空间。幸福感作为主观体验,是多元需求满足与否的综合反映,其形成并受限于客观生活。对于流动老人来说,迁移通常将他们的客观生活置于多重压力环境下^[2]。因此,下面我们将在压力过程理论指导下,从压力暴露机制和压力易感性机制两个方面综合考察流动老人幸福感的形塑机制。

(二)迁移压力:流动老人幸福感的风险挑战

表2从压力暴露机制出发,重点探讨的是,流动老人在迁移过程中的压力与其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由于压力是经济保障压力、社交生活压力和制度排斥压力的复合体,因此我们除了考察压力的整体效应外,还将考察三者的单一效应,以全面揭示压力对幸福感的影响效果。

从压力的整体效应来看,模型1.2显示,迁移总压力的回归系数为0.166,且在0.00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统计检验。说明这个指标的分值越大(即迁移总压力越小),流动老人的幸福感越高。该发

[1]Headey, B., Wearing, A., “Personality, Life Event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Toward a Dynamic Equilibrium Model”,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1989, 57(4), pp.731-739.

[2]Shuval, J. T., “Migration and Stress”, in Goldberger, L.B. and Shlomo, B.(Eds.), *Handbook of Stress: Theoretical and Clinical Aspects*, New York: Free Press, 1993, pp.641-657.

现与压力暴露机制的基本主张相符,正如应激理论所指出的,迁移压力作为一项强大的负性应激源,会降低流动老人的社会生活适应水平,容易诱发情绪衰竭,进而影响到幸福感^[1]。即假设 1 得到支持。

从压力的单一效应来看,模型 1.3 显示:一方面,与压力的整体效应类似,经济保障压力和社交生活压力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值(0.144 和 0.371),且在 0.01 或 0.001 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统计检验。

说明这两个指标的分值越大(即经济保障压力越小、社交生活压力越小),流动老人的幸福感越高。另一方面,虽然制度排斥压力的回归系数也为正值(0.015),但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制度排斥压力对流动老人幸福感的负向影响仅局限于调查样本范围,而不具有统计推广性。这可能是因为近年来我国推行的户籍制度和相应衍生制度大幅度改革,让流动人口获得了诸多实实在在的好处,因而感知到的制度排斥压力及其消极后果在不断减小。可见,压力对流动老人幸福感的影响并非整齐划一的,而对压力的多角度分析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辨识流动老人幸福感形成的压力暴露机制。即假设 1a 和 1b 得到支持,假设 1c 没有得到支持。

此外,从社会人口学变量来看,模型 1.1 显示,性别和宗教信仰没有通过统计检验,即它们对流动老人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而年龄、婚姻状态和户口性质均通过了统计检验,即它们深刻影响流动老人的幸福感。具体地说,相比低龄流动老人,高龄流动老人的幸福感更高;相比不在婚状态的流动老人(如未婚、丧偶),在婚状态流动老人的幸福感更高;相比农业户口的流动老人,非农业户口流动老人的幸福感更高。值得注意的是,当纳入压力变量后,婚姻状态和户口性质的回归系数不再显著,而被压力的影响所抑制。

(三)家庭关系网与自我效能感:流动老人幸福感的保护资源

根据泊林等人提出的压力过程理论,流动老人幸福感不仅取决于迁移压力带来的冲击与影响,还取决于个人或群体对迁移压力的感受

表 2 压力对流动老人幸福感影响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变量类型	模型 1.1 B(S.E)	模型 1.2 B(S.E)	模型 1.3 B(S.E)
性别	-1.900(1.737)	-2.346(1.654)	-2.203(1.601)
年龄(低龄老人=0)			
中龄老人	0.779(1.860)	-0.692(1.781)	-0.029(1.736)
高龄老人	5.698+(3.025)	5.915*(2.880)	5.923*(2.783)
婚姻状态(不在婚=0)	4.056*(2.009)	2.832(1.919)	1.884(1.860)
是否信仰宗教(否=0)	3.415(2.492)	2.968(2.373)	2.768(2.293)
户口性质(农业户口=0)	3.977*(1.701)	-0.496(1.719)	0.898(1.741)
迁移总压力		0.166*** (0.021)	
经济保障压力			0.144** (0.052)
社交生活压力			0.371*** (0.038)
制度排斥压力			0.015 (0.034)
F	2.764*	11.262***	14.229***
ΔR ²	0.018	0.110	0.170

注:(1)迁移总压力是经济保障压力、社交生活压力和制度排斥压力的总和;
(2)+ p<0.1, *p<0.05, **p<0.01, ***p<0.001。以下类同。

表 3 两类资源对流动老人幸福感影响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变量类型	幸福感				自我效能感
	模型 2.1 B(S.E)	模型 2.2 B(S.E)	模型 2.3 B(S.E)	模型 2.4 B(S.E)	模型 3 B(S.E)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迁移总压力	0.158*** (0.021)	0.158*** (0.021)	0.150*** (0.022)	0.136*** (0.022)	0.124*** (0.024)
家庭关系网	0.158*** (0.039)	0.159** (0.040)			
自我效能感			0.129*** (0.037)	0.122*** (0.037)	
迁移总压力× 家庭关系网		0.000 (0.001)			
迁移总压力× 自我效能感				-0.002* (0.001)	
F	12.117***	10.757***	11.570***	11.038***	9.799***
ΔR ²	0.132	0.131	0.127	0.134	0.096

[1]Sheila, N. et al., "Factors Related to Well-being in Irish Adolescents", *The Ir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2005,26, pp.123-136.

与反应。因此,表3将从压力易感性机制的方向出发,揭示作为中介资源的家庭关系网和自我效能感与流动老人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首先,从家庭关系网和自我效能感的直接效应来看,模型2.1显示,家庭关系网的回归系数为0.158,且在0.00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统计检验,说明该指标的得分越高(即家庭关系网越好),流动老人的幸福感越高;模型2.3显示,自我效能感的回归系数也为正值,且在0.00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统计检验,说明该指标的得分越高(即自我效能感越强),流动老人的幸福感越高。为检视两类资源的作用大小,我们还将家庭关系网和自我效能感一起纳入回归模型,结果显示,家庭关系网和自我效能感依然在0.00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统计检验,且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为0.150和0.134,即上述结果再次获得证实,而家庭关系网的影响相对较大。可见,无论是外在资源,还是内在资源,都可能成为流动老人迁入地生活保障的重要支持系统,进而积极影响生活评价、增进幸福感。假设2a和假设3a得到支持。

其次,从家庭关系网和自我效能感的调节效应来看,模型2.2显示,迁移总压力和家庭关系网的回归系数均在不同显著性水平上通过统计检验,而二者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没有通过统计检验。这说明家庭关系网在流动老人的迁移压力与幸福感之间不具有调节效应,无法改变迁移压力带来的幸福损耗。与之不同,模型2.4显示,迁移总压力和自我效能感的回归系数均在0.00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统计检验,且二者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0.002,并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统计检验,即自我效能感对迁移压力大的流动老人幸福感的作用更明显。这说明,自我效能感在流动老人的迁移压力与其幸福感之间具有缓冲功能,部分释放了迁移压力的现实感知与消极后果。相较于家庭关系网,自我效能感更可能成为自我解压的稳定调节剂。假设2b不能得到支持,而假设3b得到支持。

最后,从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效应来看,通过Baron和Kenny^[1]的依次检验回归系数法可知:在第一步检验程序中,c的取值为0.166,且在0.00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统计检验,说明该指标得分越大(即迁移压力越小),幸福感越高,即迁移压力对流动老人幸福感存在明显的负面效应。在第二步检验程序中,a的取值为0.124,且在0.00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说明该指标得分越大(即迁移压力越小),自我效能感越强,即迁移压力对流动老人自我效能感也存在明显的负面效应。在第三步检验程序中,b的取值为0.129,且在0.00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说明该指标得分越大(即自我效能感越强),幸福感越高,即自我效能感对流动老人幸福感存在明显的正面效应;c'的取值为0.150,且在0.00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说明添加自我效能感后,虽然迁移压力对流动老人幸福感的负面影响减小,但仍然作用显著。因此,根据依次检验回归系数法的相关假定,自我效能感在迁移压力与流动老人幸福感之间具有部分中介效应,即迁移压力不仅会直接削弱流动老人幸福感,还会通过削弱流动老人的自我效能感,诱发情绪衰竭,进而影响幸福感。假设3c得到支持。

(四)稳健性检验:乡—城与城—城流动老人的比较分析

上文总体模型检视了压力过程理论视角下流动老人幸福感形成的三个基本假设,即迁移压力会削弱流动老人幸福感,而作为资源代表的家庭关系网和自我效能感会增进流动老人幸福感,且自我效能感还扮演调节与中介角色。但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格局下,相比城—城流动老人,乡—城流动老人会面临“农村人”和“外地人”的双重劣势。考虑到户籍身份对流动老人的压力、资源及其与幸福感的可能影响,本文将分别讨论乡—城与城—城流动老人样本(见表4和表5)。

首先,从压力的影响来看,模型4.1和模型6.1显示,迁移总压力在乡—城和城—城流动老人样本

[1]Baron, R. M., Kenny, D. A., "The Moderator-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Conceptual, Strategic 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6, 51, pp.1173-1182.

中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值,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该指标得分越大(即迁移压力越小),乡一城和城一城流动老人幸福感越高。添加家庭关系网、自我效能感及其与压力的交互项后,压力对乡一城和城一城流动老人幸福感的削弱效应仍具有稳定性,与总体模型结论保持一致。同时,比照迁移总压力在乡一城和城一城流动老人样本中的回归系数大小可知,压力对乡一城流动老人幸福感的消极影响更大。

其次,从家庭关系网的影响来看,一方面,模型 4.2 和模型 6.2 显示,家庭关系网在乡一城和城一城流动老人样本中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值,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该指标得分越大(即家庭关系网越好),乡一城和城一城流动老人幸福感越高;另一方面,模型 4.3 和模型 6.3 显示,迁移总压力与家庭关系网的交互项系数都未通过

显著性检验,说明家庭关系网能独立地提升乡一城和城一城流动老人幸福感,而不能有效调节压力对其幸福感的消极效应,也与总体模型结论保持一致。

最后,从自我效能感的影响来看,与家庭关系网类似,模型 4.4 和模型 6.4 显示,自我效能感在乡一城和城一城流动老人样本中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值,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该指标得分越高(即自我效能感越强),乡一城和城一城流动老人幸福感越高;但有所不同的是,模型 4.5 和模型 6.5 显示,迁移总压力与自我效能感的交互项系数在城一城流动老人样本中通过统计检验,而在乡一城流动老人样本中不显著,即自我效能感仅在城一城流动老人中发挥调节作用。同时,结合模型 4.1、模型 5 和模型 6.1、模型 7 可以发现,在乡一城和城一城流动老人样本中,自我效能感均在压力和幸福感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这同样与总体模型结论保持很大的雷同性,而自我效能感未能缓解迁移压力对乡一城流动老人幸福感的负面影响可能是由于该群体面临更多迁移压力,根据压力易损性假设,当面对较多迁移压力时,自我效能感会丧失其对抗压力的能力,折射出乡一城流动老人存在户口性质(城乡差分)与地点(内外之别)排斥等多重劣势^[1]。

表 4 压力、资源对乡一城流动老人幸福感的影响分析(N=254)

变量类型	幸福感					自我效能感
	模型 4.1 B(S.E)	模型 4.2 B(S.E)	模型 4.3 B(S.E)	模型 4.4 B(S.E)	模型 4.5 B(S.E)	模型 5 B(S.E)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迁移总压力	0.201*** (0.034)	0.193*** (0.034)	0.192*** (0.034)	0.186*** (0.034)	0.170*** (0.037)	0.110** (0.036)
家庭关系网		0.129* (0.061)	0.139* (0.066)			
自我效能感				0.142* (0.059)	0.115+ (0.064)	
迁移总压力× 家庭关系网			0.001 (0.002)			
迁移总压力× 自我效能感					-0.001 (0.001)	
F	6.397***	6.202***	5.427***	6.417***	5.772***	2.722*
ΔR ²	0.113	0.126	0.123	0.130	0.131	0.039

表 5 压力、资源对城一城流动老人幸福感的影响分析(N=332)

变量类型	幸福感					自我效能感
	模型 6.1 B(S.E)	模型 6.2 B(S.E)	模型 6.3 B(S.E)	模型 6.4 B(S.E)	模型 6.5 B(S.E)	模型 7 B(S.E)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迁移总压力	0.131*** (0.027)	0.121*** (0.027)	0.120*** (0.027)	0.114*** (0.028)	0.105*** (0.028)	0.137*** (0.032)
家庭关系网		0.197*** (0.051)	0.203*** (0.052)			
自我效能感				0.126** (0.047)	0.141** (0.048)	
迁移总压力× 家庭关系网			-0.001 (0.001)			
迁移总压力× 自我效能感					-0.002+ (0.001)	
F	6.400***	7.803***	6.871***	6.614***	6.225***	5.536***
ΔR ²	0.090	0.126	0.125	0.107	0.113	0.076

[1] Vanderbilt-Adriance, E., Shaw, D. S., "Conceptualizing and Re-evaluating Resilience Across Levels of Risk, Time, and Domains of Competence", *Clinical Child & Family Psychology Review*, 2008, 11(1-2), pp.30-58.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研究利用经验数据探讨了流动老人的幸福感现状与特征,并以压力过程理论为指导,从压力暴露机制和压力易感性机制出发,综合考察了流动老年人幸福感的形成机制,以期提升其生活质量。通过分析研究我们主要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一是,通过对流动老人幸福感的整体分析和内部比较发现,迁移对流动老人幸福感的影响具有一定复杂性:流动老人幸福感的总体态势较好,反映出迁移带来流动老人美好生活的积极一面。但该群体幸福感的内部波动较大,特别是在二元结构体制下,乡一城流动老人的幸福感劣势较明显,折射出迁移在幸福效用上的选择性和区隔性。

二是,迁移压力是制约流动老人幸福感的关键因素。沿着压力暴露机制的方向追溯,流动老人在迁移过程中势必面临诸多生存和发展性压力,如经济保障压力等,而这不仅影响着他们的安身立命,也制约了其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经济保障压力等因素的存在,也直接构成该群体幸福感的强大负面冲击力量。不过,迁移压力的内部构成并非具有同等影响,相比之下,经济保障压力和社交生活压力的作用更加明显。这一发现符合“社会人”假设,即影响流动老人幸福感的是就业、收入、保障等物质因素和交往、沟通、精神感受等非物质因素的综合。

三是,家庭关系网和自我效能感作为流动老人的保护资源,因内外属性之别而以独特方式提升该群体的幸福感。流动老人的幸福感水平并非完全取决于压力冲击,还有赖于压力应对,即它是压力与资源平衡的产物。其中,家庭关系网是流动老人在陌生环境中最亲密的外部支持,并独立而稳固地增进该群体幸福感;自我效能感是储藏于自身的内部资源,它除了能发挥直接的正向影响外,还扮演着调节与中介的双重角色,并能有效地缓解迁移压力与幸福感之间的紧张关系。

此外,流动老人的身份特征也是影响该群体幸福感的重要维度,并深刻影响压力、资源与流动老人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结构。分析中我们发现,户籍制度的“双二属性”让乡一城和城一城流动老人处于不同境地,相较而言,乡一城流动老人不仅承受更多迁移压力,还削弱了诸如自我效能感等对资源的保护效能,使其幸福感更低。

基于以上发现,本文想提出的政策建议是:首先,“统分结合”是研判流动老人幸福感的技术方略。描绘流动老人幸福感分布特征是进行有效改善的一项基础性工作,这不仅需要“统”指导下的总体定位,还需要“分”指导下的内部识别。其次,化解迁移压力是维系流动老人幸福感的基本前提。迁移压力是冲击流动老人幸福感的强大压力源,包括就业、交往、歧视等诸多方面,牵涉迁入地的市场、居民、政府等诸多主体。要优化迁入地社会环境,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公正行为。再次,开发资源是提升流动老人幸福感的重要路径。资源是流动老人进行压力应对和情绪维系的本钱,要坚持“输血”与“造血”并举,在积极构建外部支持的同时,注重流动老人心理资本培育,增强其自我调适能力。最后,因人(群)而异是干预流动老人幸福感的精准良策。流动老人的情况是复杂多样的,不同类型流动老人群体的特征、压力感知与资源禀赋等是存在差异的,而导致其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又不尽相同,这就需要我们尽可能地做到“一群一策”,并针对实际情况去解决问题。

[责任编辑:方心清]